

现行体制下牧区旱灾及牧民应对行为之实证研究

苏德斯琴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在以定居放牧及草场的个人承包使用为主要特征的内蒙古牧区,由旱灾引发的损害愈来愈严重,很大程度上已开始阻碍了畜牧业经济的持续发展。本研究以内蒙古中部正镶白旗牧业地区为实例,关注了旱灾及牧民的抗旱行为。从中得知:延续多年的游牧生活已经失去其存在的根基,传统的游牧模式已被废除。只有极少数拥有亲属网络的牧户,采纳<敖特儿>形式。多数牧户大量抛售牲畜,极端缩小经营规模,只好等待和祈祷下一年度的命运。饲料及干草(包括鲜草)昂贵的价格,大大提高的经营成本,使牧户无法维持现有的规模,而且,多数牧户也无法承担所需资金。牧区基层组织已名存实亡,缺乏代表牧民自身利益的组织,市场信息既不及时又不准确,使多数牧民在牲畜市场交易中处于极其不利之地,从而经济利益严重受损。一部分牧户开始经营奶牛饲养业,可是,奶牛及饲料的价格昂贵,同时也缺乏饲养奶牛配套技术指导及兽医人员等致命性问题。从上述结果中,我们可以断定,现行体制下的抗灾行为已显露出严重的问题(此地区),如不积极采纳合理的支援、补救措施,必定影响牧民最基本的生产与生活水平,甚至,整个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草场承包制;游牧模式;旱灾应对行为;内蒙古牧业地区

中图分类号：F127(22)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所在及研究目的

在地处内陆干旱及半干旱地区的蒙古高原,经常发生局部性干旱是由其自然环境所决定的必然现象之一。对游牧民来说也并非希罕之事,可称其为他们生活及生产活动中的一部分。从古到今,蒙古族及其先民们,掌握自然规律,顺应气候变化,结合草原生态系统之非平衡特征,创造、继承及运用一套以游牧为核心的畜牧业经营模式,走过了千百年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辉煌历史。当年,震撼世界的蒙古帝国的诞生,无疑是以繁荣富强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的,而发达的畜牧业经济必定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前提条件的。但是,随着时代及社会体制之变迁,政府核心机关部分官员及学术界人士非常轻率地把游牧模式视为一种原始、落后、非科学的生产方式来加以否定,从而曾拥有辉煌历史的游牧模式逐渐消失。尤其,从1998年开始实行的草场个人承包责任制,事实上更加系统地废除了传统的游牧模式继续存在的根基。那么,失去传统游牧模式的牧民,在新环境、新体制之下,采用何种方式来经营畜牧业,维持其生计呢?他们是如何应对大自然的冲击,克服干旱等灾害,保持畜牧业持续再生产的呢?现行体制下的抗灾体系中存在哪些问题?这些不仅关系到每个牧民个体生计之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且也影响到整个牧区畜牧业经济之稳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环节。或许,旱灾是自然界造成,而不属于人为因素所致等认识上的缘故,对这一环节的研究调查似乎被冷落。综观畜牧业经济问题的研究现状发现,除了一部分笼统的理论性研究成果之外,以现行体制下

牧民个体行为作为焦点的实证性研究几乎不见。而准确把握牧区经济中的实际情况,挖掘其中存在的问题则是克服、纠正不合理的运作,最终达到可持续发展之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基于上述背景问题及对其认识,策划设计了此次以发生旱灾地区旱情及牧民应对行为作为核心切入点的实证研究。此研究之目的为分析探讨在新经济体制及新的草场利用制度下,牧民们遇到干旱年份时所采取的抗旱应对行为及其存在的问题,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对现行体制之下运行的牧区抗旱体系加以评价。

作为本研究之实例调查地区,选定了今年(2007 年)旱情较严重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牧业地区,并进行了相关的资料搜集及实地考察。

二、调查区域概况

(一) 自然环境及土地利用概况

正镶白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锡林郭勒草原西南部,东经 $114^{\circ} 15'$ — $115^{\circ} 37'$,北纬 $42^{\circ} 05'$ — $43^{\circ} 02'$ 之间。东部及东南部与正蓝旗为邻,南部与河北省及太仆寺旗交界,西部和乌兰察布盟接壤,北部与苏尼特旗相望(图 1)。大部分地区海拔 1100-1500m,南部以丘陵地带为主,北部为浑善达克沙地一部。属于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1.9°C ,冬季寒冷、强风,夏季高温炎热。年平均降水量为 363mm,其中 80%集中在夏秋两季。无霜期为 112 天,年平均风速为 4m/秒,年平均蒸发量为降水量之 4 倍,达到 1931mm。

全旗土地总面积为 934.5 万亩(6229 平方km)。其中 865.2 万亩为草场,占总面积的 91.4%。耕地面积为 30 万亩,占总面积的 4.3%。林地面积为 16 万亩,占总面积的 1.7%。城镇居住面积为 4.万亩,占总面积的 0.5%。水域面积为 5.7 万亩,占总面积的 0.6%。除此之外,未利用土地面积有 8.1 万亩,占总面积的 8.7%(正镶白旗志,2004 年)。从内蒙古自治区各畜牧业旗县总面积来看,正镶白旗属于草场面积相对小,因而人均土地面积也狭小的地区。现人均草场面积才 300 亩,农业地区人均耕地面积也只有 7 亩。而且,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草原退化日趋加重,其面积急速扩大。草场的可持续利用和畜牧业的稳定发展已成为地方政府及居民今后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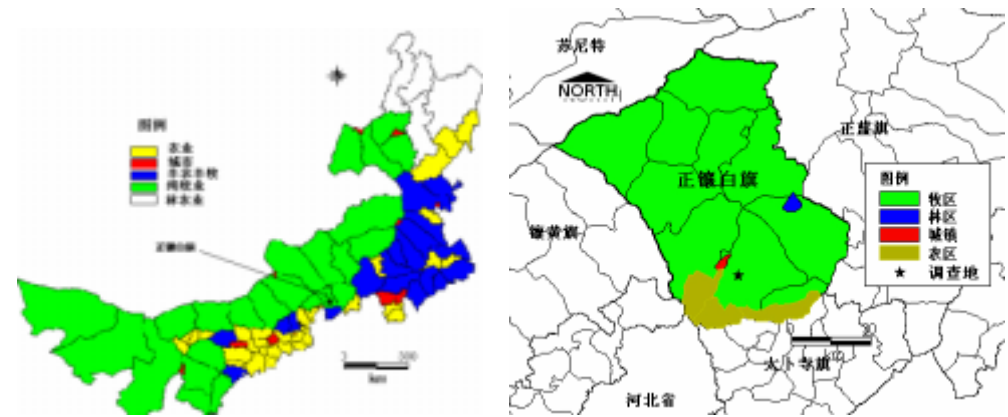


图 1 正镶白旗地理位置及土地利用概况(根据内蒙古统计年鉴及正镶白旗志制作)

（二）社会经济概况及其特征

1978年,正镶白旗全旗总人口为62408人,其中农村人口为30500人,占总人口的48.8%,牧业地区人口为25983人,占总人口的42%。总户数为13850户,其中城镇户为1335户,占总户9.6%。牧业地区户数为5591户,占总户数40.1%。农业地区户数为6924户,占总户数50%。但是到2004年的时候,全旗总户数达到21662户,增加了7812户。与此相比,总人口增长了10796人,总数为73204人(正镶白旗统计局,2005年)。虽然,总户数增长了36.1%,但,人口总数却增长了14.8%。从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开始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农牧业地区人口压力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得到缓解。其分布特征如图2所显示,南部地区主要集中在以汉族为主的农业人口,中部及北部属于畜牧业地区,以蒙古族牧民为主,同时也居住不少汉族移民。尤其,与河北省接壤的西南部明显集中汉族农民。这种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体现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农民及农耕文化向草原地区渗入的历史一页。因此,在内蒙古地区所谓的“纯牧业”地区也不过如此,和半农半牧不同的只是农业地区和畜牧业地区有明确的空间界限而已。所以说,在内蒙古称为纯牧业地区的“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纯,而是有条件的,是个打折扣的概念。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它“曾经是纯牧业地区”。

正镶白旗原有1个镇,3个乡,9个苏木,3个牧林场,2003年实行乡·苏木合并政策之后变为1个镇,2个乡,6个苏木,3个林牧场。其中把原来的政府所在地-明安图镇和原来的一个苏木、一个乡合并成明安图镇。由于把乡·镇·苏木等不同性质的区域合并成一体,给不同性质的社会指标统计带来了困难。自从2003年以后我们已无法准确把握该地区农牧业人口及国民经济详细情况。这给调查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据2003年统计资料,正镶白旗农牧业生产总值为12742万元,其中农业生产总值为3452万元,占农牧业生产总值的27%。其耕地分布特征如图3,主要分布在与河北省相接的西南部地区。而畜牧业生产总产值为9290万元,占农牧业生产总值的73%。如图4和图5所显示,目前正镶白旗畜牧业以饲养小畜为特征,其中绵羊占据比例最高。以浑善达克沙地为主的北部地区的山羊比例较高。全旗土地总面积的90%以上使用于畜牧业经营。可称为以畜牧业经营为主的畜产品生产基地之一(正镶白旗统计局,2004年)。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实施各种家庭承包制和市场经济的渗透,饲养牲畜头数急速增长,给政府及农牧民带来了经济实惠的同时,对现有有限的草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据2000年调查数据,整个草场的90%以上已面临退化,已成为自治区内草场退化极其严重的旗县之一(苏德斯琴,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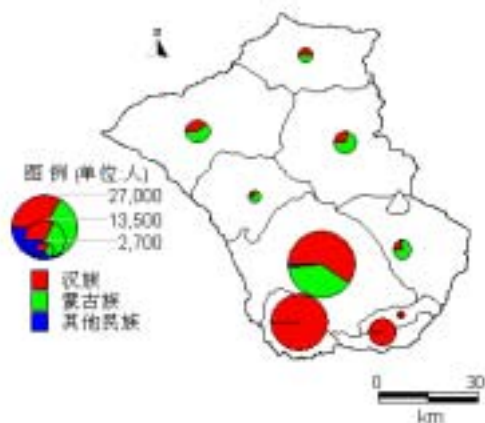


图 2 正镶白旗总人口及其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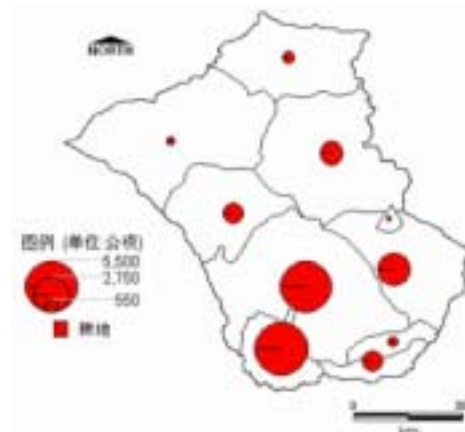


图 3 正镶白旗耕地面积及其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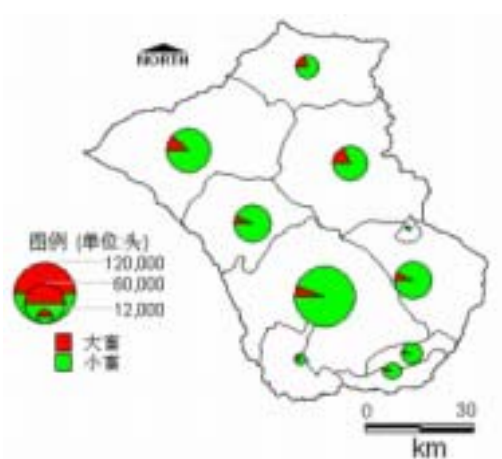


图 4 正镶白旗牲畜规模及其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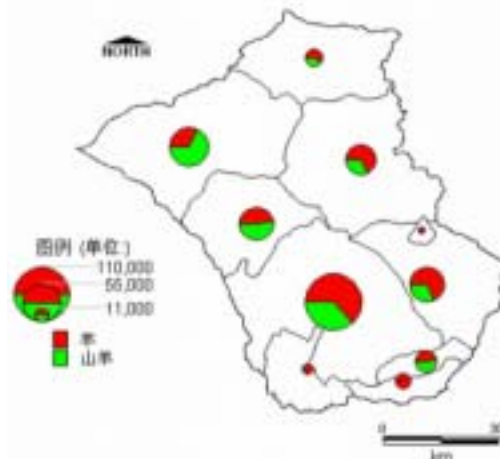


图 5 正镶白旗小畜总数及其分布

(根据《正镶白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提要》2005 年版制作)

(三) 调查村落概况

为了针对以家庭为单位的牧民个体行为进行实证调查，本研究中选定了旗政府所在地-明安图镇阿林霍勒浩特（注：浩特为村落之意；本文中简称 A 村）。正镶白旗由于草场面积相对较小，牧户没有条件分散居住，所以一般都是 10 到 20 户集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小村落成为本地区主要居住形式。A 村位于正镶白旗政府所在地-明安图镇向南 12 公里处，东部及东南部为丘陵地带，其余属于平原草地（图 6）。从表 1 可以看出，A 村共有 16 牧户，总人口为 48 人，草场总面积为 8751 亩，人均 182.3 亩，总牲畜头数为 2500 头左右羊单位。是正镶白旗典型的牧业地区村落之一。从 1998 年开始实行草场家庭承包制，2003 年和 2005 年通电，通水（自来水管）。据调查，1998 年落实草场个人承包时，根据 1991 年度各户户籍人口数及所有牲畜头数来分配草场。从 1991 年到 1998 年期间的各户家庭成员变化及饲养牲畜头数增减未被考虑，从而出现了这七年里死亡和已迁出户籍的人有权得到草场，而新出生或新迁入的人员无权得到草场的十分奇怪现象。因此，草场所有面积上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性和不

合理性。从**现在的草场**利用情况来看，除了未被分配承包的共有地（主要是山地）以外的私有草场由牧民个人投资，已全部封闭（网**围栏**），从而以山地**为主**的共用地与以平地**为主**的私用地之间形成了清晰的界限。近年来，以当作共用地的山地与**围栏间路**（为牲畜进入各自草场而留下的空隙）**为主**的区域开始退化，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给当地生态系统带来了无可挽回的破坏。草场的可持续利用已经成为本地区不可忽视的环境、民生问题之一。



图6 调查村落位置(根据 Google Earth 卫星图片制作)

表1 A村概况

户数	总人口		总草场面积 (单位:亩)	人均草场面积 (单位:亩)	总牲畜头数(单位:只;头)			
	男	女			羊	山羊	牛	奶牛
16	27	21	8751	182.3	1566	530	178	21

根据2007年实地调查制作

三、旱灾及畜牧业经营

(一) 旱情及草场概况

今年(2007 年)在正镶白旗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旱灾。据实地访问调查，自从去年冬季开始降水量大幅度减少，只降两场小雪,导致了春季更加干旱。到了夏季 6、7 月份草场植物生长的黄金时期仍然没有降雨。一直到 8 月 1 日才降下了今年第一场雨。虽然，给极度干旱的草原带来了一时生机，可从草场植被生长条件来看为时已晚。那么，草场和往年比究竟如何呢？在此对比察看以下摄影资料记录。图片 1 和图片 2，图片 3 和图片 4，图片 5 和图片 6 分别是 2004 年和 2007 年几乎同一位置拍摄的 A 村草场片段。与 2007 年相比 2004 年是风调雨顺的好年份。从这些摄影资料的对照，2007 年的旱情程度一目了然。如何抗旱救灾，维持生计之问题，毫无疑问地落到了每个牧民的头上。



照片 1 (2007 年 9 月 9 日)



照片 2 (2004 年 7 月 28 日)



照片 3 (2007 年 9 月 9 日)



照片 4 (2004 年 7 月 28 日)



照片 5 (2007 年 7 月 30 日)



照片 6 (2004 年 9 月 9 日)

(二)旱灾及其历史

为了加深我们的理解,在此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如前章所述,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来说,干旱并非新鲜之事。那末,自古以来,游牧民在变幻莫测的气候变化及无情的自然灾害面前,是如何克服自然灾害,维护其畜牧业之再生产,保持人与自然,牲畜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呢?就此问题古今中外,均有笔墨,在此没有必要重复追述。其核心就是根据每年每季草场

状况来**进行**游牧。本研究中**实例—A 村**牧民也不例外。笔者在**实地考察中**,针对**草场个人承包**之前的牧民**旱灾应对行为进行了访问调查**。新中国成立之前是和其它牧业地区**同样**,以游牧作为其主要**经营方式**,以**牧主家族为单位的分散性经营为基础**。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及各级政府**逐步废除了私有制体制的同时**,推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采纳了集体所有制。草场和牲畜两者都属于集体所有,其**生产、管理、分配等各环节都是在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领导下进行**。所以,**每逢干旱年份时**,根据旱灾范围及**实情**,相应的政府部门**进行统一调查**和安排。其普遍形式为**处理一部分老弱病残牲畜来调整优化畜群**,购入一定的草饲料来扶持越冬。如果超出上述**过冬能力范围**,则政府有关部门出面,选定“敖特儿”营地。最后,以**男性为主的一部分劳力和牲畜一同前往目的地越冬或越过干旱期**。到了 1982 年**实行家庭生产责任制时期**,虽然牲畜属于各家庭所有,但草场仍然是集体所有,所以牧民的抗旱行为模式基本上**继承了原有的“敖特儿”模式**。但,由于**对牲畜已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政府部门的**交涉或援助力度开始减弱**。牧民主要是依靠自己**亲属关系寻找“敖特儿”营地等方式来对付旱灾及其它自然灾害**。图 7 为 A 村各牧户在近 50 年间内所游牧移动的空间范围图。从中可以看出,仅这十几户牧民游牧移动的面积**能够达到 500 公里之广**,不仅包括整个盟市范围,还跨越到其它盟市的领域。从中也可以看出**蕴涵在其背后的区域间和谐共处的精神和牧民们患难与共的草原文化氛围**。



图 7 A 村牧民“敖特儿”范围图(1949 年~1998 年)根据实地调查数据制作

(三) 现行体制下牧民畜牧业经营及旱灾应对行为

从 1998 年开始,实施草场个人承包责任制,这对草原畜牧业及牧民们来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历史上,牲畜的个人所有制曾经有过。但,草场的家庭分割所有形式可以说是第一次。畜牧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草场之所有形式及其利用模式的变化,给牧民畜牧业经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涉及到牧民畜牧业经营规模、畜群结构、饲养方式及文化氛围等诸多方面。本论文之焦点—旱灾应对行为就属于其中的重要一环。

1. 抛售牲畜缩小经营规模

不能靠天吃饭,要靠科学、靠现代化放牧的号召已持续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旱灾面前的多数牧民仍然显得束手无策,最终还是选择了极其朴素的方式,即抛售多数牲畜极端缩小其经营规模,祈祷、等待下一年度的命运成为他们首选行为。其实牧民各自也清楚,极端的缩小经营规模,对于今后的生活及再生产将会带来巨大的困难和风险。但,毕竟比起在冬春之交收拾一文不值的牲畜尸体,虽然便宜也卖掉为上策。那末,其经营规模究竟缩小到何种程度呢?首先,表2为A村各户饲养绵羊总数及抛售情况。绵羊为本地区最主要的畜种之一,一般占据各牧户牲畜总数之多半以上。在A村饲养绵羊牧户共有13户,饲养头数最多达到215只,最少的有11只。出售比例达到50%以上的牧户,占饲养绵羊总户数的76.9%。甚至其中有5户的出售量超过了80%以上。其次,表3为A村各户饲养牛(包括奶牛)总数及抛售概况。A村16户中有15户在饲养3-32头之间不同数量的牛,其中多数为本地肉牛。从表中可以看出,除饲养奶牛的2户以外,所有牧户都不同程度地缩小了饲养头数,其中多数牧户抛售了50%以上,甚至达到100%的牧户有4户(同时也买入了不同数量的奶牛)。最后,表4为各户山羊饲养及抛售概况。历史上山羊并非本地区主要的畜种之一,其数量也一直不多。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山羊绒行业的发展,山羊绒需求量及价格上升,饲养户数逐年增多了起来。现在,有7户饲养山羊,亦可称为本地区重要的畜种之一。俗称山羊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干旱的草地里也能维持生命之延续。可是今年也未能逃脱出被抛售屠宰之命运。除了2户留下一少部分以外,多数牧户全部出售处理。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抛售绝大部分牲畜来缩小经营规模则是今年本地区牧户所选择的最基本的旱灾应对行为。草场个人承包制度已经杜绝了走“敖特儿”的可能性。即时要走“敖特儿”也得需要租用对方的草场。那样会提高经营成本,最终导致事倍功半,没有利润。

那么,购买饲料或干草来进行“舍饲”会如何呢?其实,购买饲料或从外地购买鲜草(包括干草)来越冬也是当地牧民近几十年来惯用的方法之一。

表2 A村各户饲养绵羊及出售详情

编号	羊(只)		
	原有数	出售	所占%
1	0	0	0.0
2	0	0	0.0
3	0	0	0.0
4	18	7	38.9
5	101	47	46.5
6	180	88	48.9
7	215	115	53.5
8	180	110	61.1
9	60	40	66.7
10	70	50	71.4
11	108	82	75.9
12	117	96	82.1
13	96	81	84.4
14	200	180	90.0
15	210	210	100.0
16	11	11	100.0

表3 A村各户饲养牛及出售详情

编号	牛(头)			奶牛(头)	
	原有数	卖出	所占%	原有数	买入数
1	0	0	0	14	
2	0	0	0	1	
3	0	0	0		
4	10	2	20		
5	32	7	22		
6	21	5	24		
7	14	4	29		
8	11	4	36		
9	19	7	37		
10	10	5	50		
11	16	11	69		
12	22	16	73		
13	10	10	100		2
14	3	3	100		2
15	5	5	100	6	5
16	5	5	100		1

根据 2007 年 8 月实地考察调查数据制作

2. 购买饲料及经营成本

购买饲料及鲜草（包括干草）来维持牲畜越冬算是近几十年提倡的所谓“科学养牧”方针的重要一环。但如今饲草料市场价格上涨幅度大，已不能成为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末，在此根据 A 村牧民提供的有关数据来实证一下，为何“舍饲”未能成为牧户的首选方式问题？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成本核算。据调查，要保持一只羊一天的最低“生活水平”需要：3 斤草、0.2 斤饲料（玉米面儿）。而今年的鲜草市场价格为 0.5 元/斤，饲料价格为 0.8 元/斤。那么，一只羊一天的费用： $(0.5 \times 3) + (0.08 \times 2) = 1.66$ 元。越冬期为 11 月～4 月：其总费用为： $150 \text{ 天} \times 1.66 = 249$ 元。除此之外，因营养不良大大提高牲畜生病机率，有可能发生医疗费用等突发性支出。而今年一只羊卖价才 270～300 元（一般饲养 2～3 年）。1 头牛一天最低需要：15 斤草、4 斤饲料。一天的费用为： $(15 \times 0.5) + (0.8 \times 4) = 10.4$ 元。越冬期为 11 月～4 月（共 150 天）。其总费用为： $150 \text{ 天} \times 10.4 = 1560$ 元。同样不包括医疗等突发性支出。今年 1 头牛卖价是 2500 元～3000 元（3 岁大牛）。而且，这仅仅是一年的越冬费用而已。如果按饲养到 3 岁大畜期限来计算，其利润更加减少，无利可图，甚至有可能陷入亏本经营。从以上计算与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购买饲料·鲜草（包括干草）来抗旱越冬的方式不可能成为牧民常规方法。因此，只留有极少数牲畜，购入一定数量的饲料及草来越冬。即便是把饲养牲畜头数缩小到极少数也每户所支出的饲料（草）费用相当可观。表 5 为 A 村各户 2007 年度购买饲料（草）支出统计概况。大体上每户 1～3 万元不等。但是，1 万元相当于牧民的 30 只羊价值总和。对牧民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负担。

表 4 A 村各户饲养山羊及出售详情

编号	山羊(只)		
	原有数	出售	所占%
1	0	0	0
2	0	0	0
3	0	0	0
4	0	0	0
5	0	0	0
6	0	0	0
7	0	0	0
8	0	0	0
9	5	0	0
10	42	22	52
11	60	40	67
12	105	100	95
13	26	26	100
14	32	32	100
15	100	100	100
16	160	160	100

表 5 A 村各户购买饲料详情

编号	草(斤)	费用(元)	饲料(斤)	费用(元)
1	0	0	5000	4000
2	0	0	0	0
3	0	0	0	0
4	5000	2500	3000	2400
5	7000	3500	15000	12000
6	7000	3500	6000	4800
7	9000	4500	7000	5600
8	10000	5000	3600	2880
9	10000	5000	3600	2880
10	20000	10000	5000	4000
11	30000	15000	5000	4000
12	30000	15000	5000	4000
13	40000	20000	40000	32000
14	45000	22500	3600	2880
15	50000	25000	5000	4000
16	62000	31000	5000	4000

根据 2007 年 8 月实地调查数据制作

3. 畜牧产品市场交易及牧民利益

众所周知, 畜牧产品之市场交易对牧民来说是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牲畜将要进入市场, 实现其商品价值的环节。尤其, 今年对各牧户来说, 出售牲畜则抗旱应对行为之重中之重。但, 在这个极其重要一环上, 牧民始终处于不利地位, 大市场面前显得非常无力, 自始至终处于被动地位, 不断亏损其经济利益。根据在 A 村的调查, 牧区牲畜市场交易, 大体上是通过“中介商人”来实现, 当地牧民称其为“跑商”(照片 7, 最初步行走动而得名, 而现在已用卡车)。这些“跑商”是由周围农村地区一部分破产农民和小商人组成。每年的 7~10 月份里, 这些“跑商”在牧区各村落之间不分昼夜, 东奔西跑获取相当可观的利润, 甚至牟取暴利。其中以散发不准确的交易信息进行欺骗或交付假冒货币等严重伤害牧民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总之, 我们可以说, 本地区的牲畜产品交易市场是由此类“跑商”来左右控制的。那么, 为何这些“中介商人”悄然产生持续至今, 而且“生意如此兴隆”呢? 就此问题的详细调查及分析并非本论之焦点。在此只说明自己的感性认识。恐怕很多原因在于牧区本身, 牧民本身或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等。比如, 和民族文化背景、生活风俗习惯、文字语言不同等都有一定的关系。另外, 畜牧业不同于农业, 它要求不可间断的劳动, 所以, 在牧区很少有人外出流动, 很少与外界接触, 从而缺乏准确即时的市场信息, 最终只好依托给那些“跑商”, 处于被动地位。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是, 牧民没有自己的组织, 一般都单一个人面对大市场, 显得软弱无力。即牧区基层组织可以说名存实亡。



照片 7 “跑商”满载而归



照片 8 瘦骨如柴的牛

5. 奶食品加工及饲养奶牛新动向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饲养奶牛牧户从原有的 3 户增加到 6 户, 奶牛头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的**趋势**。几年前, 从蒙牛、伊利等奶食品加工企业作为牵头的奶牛饲养业的兴起中得到启发, A 村有一对年轻夫妇也开始了饲养数头奶牛, 并建立、经营了家庭小型奶食品加工厂(照片 9)。经过几年的实践、摸索, 现在已发展成为雇佣 2-3 名工人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小型奶食品加工厂。



照片 9 奶食品加工场景



照片 10 牧民在输液治疗病牛

这和近几年政府倡导建起的移民村的饲养奶牛业不同。它虽然规模小，但却具有独立性，作为饲养、挤奶、加工、销售为一体化的实体，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经营特征。奶食品加工全部手工制作，适合消费者的嗜好，商品的销路良好，已打入首府市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A村牧民也开始选择饲养奶牛这一新兴行业。因为，一头奶牛产出的鲜奶总价，一般情况下可满足其自身所需饲草料支出的同时，稍有剩余。如果夏季草场状况良好，则可利用自家草场，不必买草，只买一定的饲料即可。

这样一来牧户的利润也相对提高。总之，和饲养本地肉牛相比有望得到一定的收入。但，奶牛价格昂贵（1头牛价格高达一万元，相当于当地绵羊 25-35 只），而且，其中存在不少的隐患。比如说，缺乏饲养技术指导、专业兽医人员的短缺、因治疗费用不规范而导致的乱收费等。很多牧民凭借自己不成熟的经验来对付或依赖个体兽医等（照片 10 牧民自己给发病奶牛输液治疗）。事实上，奶牛的乳房炎发病率很高，如果不及时对症下药会留下后遗症，大大减少其奶产量及质量，造成严重的后果。再加上，高原自然环境恶劣、相应的冷暖设施匮乏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管如何,作为一种牧民自发的、基于当地资源环境和优势而兴起的新的行为尝试,应得到我们的关注。对于草场面积小且完全定居放牧为前提条件的一部分牧业地区,类似的经营模式也许会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补救方法。但必定需要谨慎的论证、引导与扶助。

四、问题与讨论

以上以正镶白旗 A 村为例,针对现行经济体制及草场利用制度下发生的旱灾及牧民们所采取的抗旱应对行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在此围绕当今牧区经济或牧区抗旱体系提出几点问题加以讨论。

其一,草场个人承包责任制在牧民抗旱行为中已成为制度性障碍(至少草场面积较小的地区)。传统的游牧模式被视为非科学的经营模式,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根基。假设游牧模式确实是“非科学”的话,那末对其进行否定、废除应属于正常程序。但,最大的问题是否定了“非科学”模式的同时,取而代之的所谓“科学”模式并不存在。因此,出现了 A 村牧民在旱灾面前,别无选择地抛售牲畜、极端缩小或停止经营,等待下一年度之命运的悲惨现象。我们是否应该对“游牧模式”进行一次实质性的反省,而不是形式上的或文字上的。

其二,具有现代化意义的“舍饲”经营模式,亦无法成为常规有效的选择。因为“舍饲”是以大量的饲草料作为前提条件的经营模式。而饲料是在市场交易中流动的商品,其价格也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动而变动。往往是在发生干旱年份饲料价格急速上升,从而畜牧业经营成本大幅提高,最终导致亏本经营,事倍功半之结局。本文中的舍饲成本核算及牧民的选择足以说明这一点。另外,草场退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大量的饲料生产从何而来?很多地区的草场植被生产量急剧下降,无法满足更多需求。开垦建设所谓的“饲料基地”,则需要大量的地下水源,而干旱及半干旱地区自然环境却不允许大量开发地下水源和无度开垦。因此,以大量的饲料为前提条件的“舍饲”模式本身,在蒙古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当中是一个不大成熟的、有待于深刻论证的概念。

其三,牧业地区不规范的牲畜交易市场,严重损害牧民经济利益,导致牧民的综合实力下降(包括抗灾能力)。前章节中提到的以周边农业地区破产农民或小商人为主的所谓“跑商”完全控制牧区牲畜交易市场,利用一些不公正的手段来牟取暴利,严重损害牧区经济的流通领域和牧民正常的畜牧业经营活动,直接削弱牧民的综合实力。缺乏基本的集体组织、缺乏准确及时的市场信息、盲目地面对大市场等导致了牧民们在市场交易中惨遭失败。其实相应的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进行适当的市场调查及分析,给广大牧民提供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去保护其基本利益。但,牧区基层组织忙于收税或土地出让等交涉事项,已无余力关心类似的事情。

其四,在现行体制下的单一畜牧业经营,已经流露出其极大的脆弱性。从失去传统游牧环境、再加上草场退化日趋严重、自然灾害持续频发及畜牧业发展的限度等因素来考虑,家庭性、分散性,且单一的畜牧业经营已暴露出其自身的弱点。现行体制下牧民单靠小型畜牧业经营,很难保证其最基本的生活与生产秩序。旱灾面前别无选择地廉价抛售牲畜的 A 村牧民们无奈的行为足以说明了其内在的脆弱程度。从此我们可以断定,1-2 年的旱灾很有可能会摧毁牧民最基本的生产及生活秩序,使他们陷入多种困境。

其五，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奶食品加工作业为牵头的饲养奶牛业之悄悄兴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随着草原旅游事业的发展，远离牧区的城市市民也开始欣赏、消费奶食品，其消费市场逐年扩大。而牧民们拥有制作奶食品之传统的、最精美的、最全面的成套技术。基于牧民自身及周围环境的优势，以手工作业为特征的类似的尝试值得人们借鉴。它和当今流行的以蒙牛等龙头企业为引导的奶牛饲养业是不同性质的新生事物。如何去观察保护这些弱势群体中诞生的新生事物将是今后的重要课题之一。譬如，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的大环境中如何去保护这些纯真的绿色产品的品牌，如何让广大消费者去辨认质量上的差异，如何开发推销市场等都属于至关重要的问题。

五、今后的课题

本研究主要以草场面积相对小的牧业地区作为案例，对于现行体制下的牧区抗灾体系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探讨。不言而喻，内蒙古自治区东西南北跨度大，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差异大。而且，草场的个人承包责任制作为重大战略性制度，无疑是经过了各方面的测试及论证之后产生的。是以草原之可持续利用作为最终目标的重大举措。因此，仅仅通过对某一个案例分析来，对全局加以评价当然是不成立的。但是，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想达到科学发展的目的，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对现实进行精细的调查研究。尤其对于畜牧业经济体系当中的内在的问题及缺陷必须进行及时的发现和反省。只有这样才能酝酿出更加合理、更加科学、更加完善的体制与制度。因此，选择不同类型的地区，进行更加详细的实地考察、更加精密的分析研究则是我今后的重要课题之一。另外，尊重大自然的选择，即尊重蒙古高原大自然给我们选择的草原植物、动物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将成为今后调查研究工作之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我们（不论属于何种阶级、何种主义或阶层）必须依靠大自然、顺应大自然之规律去安排我们的生活及生产活动。违背大自然的法则将受到致命的惩罚。

参考文献

- [1]内蒙古统计局编.内蒙古统计年鉴[M].各年度版,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2]正镶白旗志编写委员会编.正镶白旗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 [3]正镶白旗统计局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提要[M].正镶白旗统计局印刷.2005.
- [4]苏德斯琴.草场承包制度与畜牧业经营·草场利用之变化[J].日文,季刊地理学,2005年,第57卷第3号.

An Empirical Study on Drought Measures in The Stock Farming Area Under Current System

Sudesiqin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Abstract:: In this paper, Showlonchagan Banner, a stock farming area loca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Inner Mongolia was chosen as the study area. This study focused on measures that the herdsmen take to deal

with drought. The analysis result shows that basically the Otor method (moving with livestock during an extended period) from the past became impossible and traditional nomadic herding method was fundamentally repealed. Nowadays only the households with relatives in other areas go to Otor while attempting to maintain the minimum management scale to make ends meet. But this kind of network doesn't exist for most herdsman households. More than half of the herdsman households struggle to run a minimum management scale by keeping the livestock in a barn. The rising price of hay and feed ended up with an expensive management cost,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se herdsman to maintain a minimum management scale. As a result, a lot of households sell a great part of their livestock, therefore even maintaining the minimum management scale turned out to be difficult. Moreover, when selling their livestock, herdsman are suffering from lack of market information and the absence of herdsman's organizations, for example, a herdsman's union. This situation has a good chance to bring further loss to herdsman when they want to purchase livestock for the management restoration in the future. In some herdsman's households, a trend of dairy cow breeding was confirmed. However,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high price of dairy cows, the shortage of technical support and the absence of trade connection, showed that as a kind of draught measure, this practice is not necessarily effective. As a conclusion, a survival measure from drought is urgently needed under the current system.

Key words: pasture land contract system; nomadic method; drought measures; Inner Mongolian stock farming area

收稿日期：2008-03-08；

作者简介：苏德斯琴（1964—），男，蒙古族，内蒙古锡林高勒人。理学博士，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农牧业经济研究。